



复旦文史专刊之一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 从周边看中国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复旦文史专刊之一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 从周边看中国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周边看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北京: 中华书局, 2009.6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专刊)

ISBN 978-7-101-06636-4

I.从… II.复… III.中国—历史—研究 IV.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6731号

---

**书 名** 从周边看中国

**编 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丛 书 名**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专刊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31¼ 插页2 字数550千字

**印 数** 1—2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636-4

**定 价** 65.00元

---

# 序

按照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说法,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标志,是“从天下到万国”。从以自我中心想象天下的“华夷观”中走出来、打消了盲目自大的近代中国,却逐渐养成了以西方为背景审视自身的习惯,“中”和“西”(或者“东”和“西”),中国一方面习惯地把自己看成“东方”的代表,一方面开始把“西方”作为认识自我的唯一镜子,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梁漱溟,无论是“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还是“中国文化本位论”,中国始终都是在西方这个尺度中被观看的,美丑妍媸,都来自那一面镜子。不过现在想来,尽管镜子相当清晰,但我一直在想,恐怕仍然需要借助前后左右多面镜子映照,才能够看清中国的立体形象和细部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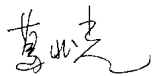
“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话题和这次会议就缘起于这样的想法。2006年下半年,当我接受复旦大学的邀请,来上海主持新成立文史研究院时,我一直在想,如何用好现有的资源,追随当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办一个多少可以实现某些学术理想的研究机构,当时我觉得,清华国学院和史语所之所以成功,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在研究领域上介入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第二,不仅是“预流”,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它也建立了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第三,得益于“天时地利”,所谓天时地利,是说那个时代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等,给他们提供了超出前人的材料。这些使得清华研究院和史语所在当时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中心。

当时我提出,希望以“从周边看中国”这一主题,来推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进入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因为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说到,“从周边看中国”,不仅在观念上可能会促使我们重新认知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在文献上可能会激活相当多过去不曾重视的日本、韩国、越南有关中国的资料,在方法上也会刺激多种语言工具的使用和学术视野的扩展。八十年前,傅斯年创立史语所时曾说,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就是学术的进步。

正是缘于这一构想,2007年12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日本关西大学

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气氛相当热烈的会议上,来自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贡献了三十余篇论文,内容涉及了日本、朝鲜、越南以及欧洲对中国的记录,也涉及了异文化之间的彼此想象和观感,还包含了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涉的方法论,它们既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化交涉即异文化间的彼此接触史,更可以说是各个文化的自我认识史。现在呈献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收录的就是这次会议上各位学者的论文。

在这里,我要感谢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为我们出版这部作为“复旦文史专刊之一”的文集,还要感谢各位与会发表论文的学者。也要感谢呈交了论文却因故未能与会的学者,稍稍遗憾的是,有几位作者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提供完整的论文,我们只能把他们的发言摘要或论文提要,作为附录放在全书之后。



2008年9月于上海

# 目 录

|                                                             |         |     |
|-------------------------------------------------------------|---------|-----|
| 序 .....                                                     | 葛兆光     | 1   |
| 日本是第二个罗马(小中华)吗? 18 世纪德川日本“颂华者”和<br>“贬华者”的问题——以中医和汉方为主 ..... | [美]艾尔曼  | 1   |
| 1765 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 1764 年朝鲜通信使 .....                          | [日]夫马进  | 26  |
| 朱子学与王学在晚明和朝鲜的交错影响 .....                                     | 周振鹤     | 47  |
| 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以朝鲜的天下图和<br>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 .....           | 黄时鉴     | 59  |
| “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 .....                                     | 韩东育     | 74  |
| 从周边看中国:三个海外华人的想象和行动 .....                                   | 梁元生     | 91  |
| 17 至 18 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                               | [意]史华罗  | 106 |
| 东亚儒学与中华文化民族主义:一种来自边缘的观点<br>.....                            | [澳]梅约翰  | 119 |
| 日本德川学者的“夷夏之辨”思想论争内涵及其转变 .....                               | 张昆将     | 126 |
| 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盛邦和     | 153 |
| 汉字与“言灵”:日本传统汉字论中的“执拗低音” .....                               | 王小林     | 179 |
| 从《善邻国宝记》看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对华观 ...                                   | 朱莉丽、陈尚胜 | 198 |
| 日本《六国史》中的“唐消息” .....                                        | 王勇      | 210 |
| 徂徕学的“礼乐”与“中华” .....                                         | 王青      | 217 |
| 陆若汉及其《日本教会史》 .....                                          | 戚印平     | 227 |

|                                                              |          |     |
|--------------------------------------------------------------|----------|-----|
| 内藤湖南《支那论》中的美国因素 .....                                        | [日]陶德民   | 249 |
| 桑原隲藏的中国论述 .....                                              | 钱婉约      | 260 |
| 汉学京都学派:当时与现在?——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宫崎市定,<br>吉川幸次郎,岛田虔次,小野和子,谷川道雄 ..... | [加]傅佛果   | 271 |
| 朝鲜柳得恭笔下清乾嘉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br>藏抄本《冷斋诗集》为中心 .....           | 王振忠      | 282 |
| 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 .....                             | 孙卫国      | 313 |
| 事大至诚——从 16 世纪末“昭雪国疑”和“壬辰请援”看朝鲜李朝<br>政治核心对中国的想象和期许 .....      | [新]许齐雄   | 337 |
| 朝鲜中期文人许筠的中国体验和诗文集编撰 .....                                    | [韩]崔溶澈   | 346 |
| 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朝鲜开化官员金允植的视角 .....                                | 林学忠      | 362 |
|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                                    | [新]李焯然   | 383 |
| 再说越南本汉籍里的中国元素——以新见两种越南本汉籍<br>为例 .....                        | 陈正宏      | 396 |
| 阮辉滢及其 1765 年赴清朝担任使者时编著的书籍 ...                                | [越]丁克顺   | 405 |
|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前之后——严译与新国语的呼唤<br>.....                          | [日]沈国威   | 413 |
| 海难难民与当地官民的语言接触——从嘉庆年间漂到朝鲜、中国<br>的海难事例看周边文化交涉的多重性 .....       | [日]松浦章   | 445 |
| 中国语言学中的“周边”研究法——以文化交涉学领域之一的<br>角度 .....                      | [日]内田庆市  | 457 |
| 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 ...                               | 葛兆光      | 472 |
| 东亚的近代知识的传播与容纳——以 19 世纪末中国的报刊向朝鲜<br>传递的信息与知识为中心(摘要) .....     | [韩]李汉燮   | 484 |
| 伦理思想史中的日本、东亚与全球化——如何超越近现代的<br>“空白”(摘要) .....                 | [日]黑住真   | 485 |
| 晚清“国语”问题与单一语言制:以政治外交为<br>中心(摘要) .....                        | [日]村田雄二郎 | 487 |
| “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 汪涌豪      | 488 |

# 日本是第二个罗马(小中华)吗? 18 世纪德川日本“颂华者”和“贬华者”的问题——以中医和汉方为主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将会走向何方? 面对东亚历史上这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18 世纪的中日关系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解读线索<sup>①</sup>。那时候两者关系比较和平稳定,清代中国(1644—1911)和德川日本(1600—1866)相互视作平等国家,日本人称之为“邦”(kuni)。虽然这时期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清代中国和德川日本却相互远观着对方,并且实际上相互影响着对方。例如,在这个时期里,德川日本决定抛弃明清王朝所自称的“中国”(Middle Kingdom)这个称呼,把中国作为一个“邦(kuni)”而称之为“中华(Chūka)”、“异邦(ihō)”、“西土(Seito)”、“支那(Shina)”<sup>②</sup>。

满洲军队分别于 1627 年和 1637 年入侵朝鲜,紧接着,1644 年他们占领了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德川日本此时面对着一个重新崛起的亚洲帝国,这个帝

---

① 我从葛兆光教授之前的这两篇论文受益匪浅:(1)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 年 1 期,总 81 期);(2)葛兆光《地虽近心渐远——17 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三卷第一期总第五期,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06 年 6 月)。

② Mizuno Norihito, “China in Tokugawa Foreign Relations: The Tokugawa Bakufu’s Perception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Ming-Qing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15 (April 2003): 108–144. 和 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国或许会直接威胁到日本的安全。日本人将何去何从呢？在他们学习荷兰语、英语或是法语之前的 17、18 世纪，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致力于学习阅读和写作中国古文。我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的近世变法是在有意以帝制中华晚期为榜样。清王朝在 17 世纪 80 年代征服了台湾以及澎湖列岛之后，在 18 世纪早期，他们转向了亚洲内陆，并在中亚地区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sup>①</sup>。

我的结论是，日本对中国的好奇是从中国语言开始的，但是，这种好奇随即延伸到对当时中国的国家治理、道德论说以及医药治疗各方面的详细考察。18 世纪，日本在文学、政治以及经济各方面遇到了作为“异邦”的中国，这多重刺激使得日本人把自己想象为“中国通”。他们不仅希望能够与中国并驾齐驱，并渴望最终能够超过这个盘踞亚洲大陆的庞然大物。在日本的“中国”想象中，目的是要学习 18 世纪东亚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管理、社会和经济。这种日本在 18 世纪把中国当作“模仿对象”的注意力，到了 19 世纪理所当然地转向了欧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600 年以后欧洲在全球史中的崛起，以及大英帝国在 18 世纪的兴起，这一历史进程的很多方面和明清中国直接相关，比如它的文官制度、强大的经济，以及它的茶叶和瓷器产业<sup>②</sup>。

## 一、18 世纪中日贸易新法

德川日本不承认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力量，不过，德川政府仍然寻求平息两者间的冲突。1715 年以后，他们颁发了与明朝“勘合”类似的证明，以一种崭新的形式重新开启宁波贸易。自 1635 年以来，长崎一直是日中贸易的集散地，而清朝船只如果要进入长崎港，就必须接受日本的条款，持有日本的官方贸易证明（信牌；长崎通商照票）。明朝的“勘合”是由朝廷颁发给足利日本等朝贡国的贸易证明。足利政府屈服于朝贡国地位，接受明朝颁发的证明，德川政府

① Benjamin Elman, "Ming-Qing Border Defense, the Inward Turn of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Qing Expansion in Central A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收入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Borderland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pp. 29—56.

② Benjamin Elman, "The Jesuit Role as 'Experts' in High Qing Cartography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tory Bulletin* 31 (June 2003): 223—250。关于 18 世纪中国地位的新解释，参见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和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又见 Robert Markley,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30—17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对前朝的这种先例非常不满。1715年之后,他们终于颁发了自己的贸易证明,避免成为清朝的朝贡国<sup>①</sup>。

18世纪,长崎是“唐馆”(Tōjin yashiki 唐人屋敷)的大本营,最繁盛的时候曾经有几万中国人。但是,德川政府的贸易控制导致了前往长崎的中国船只减少,在整个18世纪,船只数量从每年70艘跌至20艘左右。相比之下,这段时间抵达长崎的荷兰船只也从每年5、6艘降至1、2艘。1715年新的贸易管制法实行之后,长崎的本地人口从1696年的64523人减至42553人<sup>②</sup>。

一些没有领取长崎信牌的中国南方商人向清政府官员抱怨日本的新法。他们指责日本作为一个朝贡国,在新的长崎信牌上使用德川年号是一种不忠的行为。于是,福建和浙江的官员没收了日本的信牌并上呈朝廷。某艘逃回长崎的船只,带着完好无损的信牌,他们向德川政府报告了此事,德川立刻向清朝抗议其对外国法律的蔑视。双方头脑都比较冷静,这场争论也很快被平息了。德川幕府并不想进一步和清廷对抗,况且,在中俄外交纷争中持有现实主义态度的康熙帝(1662—1722在位)知道,中国的货币铸造也需要来自日本的铜<sup>③</sup>。

最终结果是,整个德川时代,中国船只都必须持有日本官方信牌才能进入长崎。日本的“信牌”制度有效管理了德川政府与清朝之间的贸易,清朝政府允许在朝贡体系之外的日本(在宁波)和俄罗斯(自1689年始,在尼布楚)与中国进行通商贸易。有趣的是,18世纪前往中国的日本僧人依然坚持早先室町时代(Muromachi)的传统入关方式。例如,一群来自京都市叡山延历寺的僧人,他们于1732年9月准备牒文,1733年初冬抵达浙江时即由宁波的官员检核。天台宗僧侣所准备的牒文,一方以日本国的名义,而另一方清朝则被称为“唐”(Kara)<sup>④</sup>。

① 菊池義美《正徳新例と長崎貿易の変質》,收入《近世対外関係史論:増補版》(Tokyo: Yūshindō, 1979), pp. 154—161.

② 见 ōba Susumu,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Edo Period,” *Sino-Japanese Studies* 8, 1 (1995): 40—52, 以及 Marius B. Jansen, *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14。在中国,银比金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在中国用黄金来设定交换比率比用日本或美洲大陆的白银来设定这一比率,对商人更为有利。

③ 关于1715年中日之间的争论,参见松浦章《康熙帝と正徳新例》,收入《鎖国日本と国際交流》(2 vols. 东京:吉川弘文馆, 1988), Vol. 2, pp. 29—53。又见 Norihito, “China in Tokugawa Foreign Relations,” pp. 142—143.

④ 参见《傳教大師入唐牒》(1773的外交备忘录),在比叡山国宝殿藏展览。

作为德川时代的主要辅臣之一,新井白石(1657—1725)是将军幕府中所谓的“颂华者”,他颇以自己的汉诗为荣,并在1715年新法的酝酿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担心矿物资源通过长崎贸易大量流入中国所引起的日本的匮乏,制约了日本国内的商业发展,并导致走私增加。他指出,日本75%的黄金和25%的白银都在对外贸易中流失了。新法的目标是限制以金属尤其是铜和白银为交换手段的商业贸易,使每年来长崎的中国船只减少到30艘以下。早在1668年,日本就颁布了禁止出口白银的法令,到1763年,它成为永久性的禁令。新井同样也关注清朝的扩张政策,他觉得康熙皇帝正谋划削弱日本。

## 二、满洲的威胁和德川时代对中国的想象

满洲人征服中国引起了日本人的焦虑。熊泽蕃山(1619—1691)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武士,他因为致力于使日本适应王阳明(1472—1529)的心学而闻名遐迩,而当时的学者更倾向于正统的程朱理学。道学最初在宋代经由禅宗传入日本,这些僧侣是和镰仓(1185—1333)政权有关的。其后,在丰臣秀吉(1536—1598)入侵朝鲜期间,将一些朝鲜儒者赶到日本,他们给日本传来了最新的道学思想。熊泽蕃山在1686年《大学或问》里公开讨论,面对越来越近的满洲入侵压力,日本将如何在战略上采取适当对策,并且他强调,日本的准备实际并不充足。起初,没有人正视熊泽蕃山的讲学,但德川政府也怀有同样的忧虑,他们担心满洲军队会跨过黄海,就像当年的蒙古人<sup>①</sup>。

1674年,德川政府就已经让林鹅峰来评估满洲征服中国对日本的威胁。林鹅峰刚被任命为位于江户的幕府私塾的老师,后来以先圣殿闻名,他的父亲林罗山(1583—1657)是德川初期两位主要的程朱理学大儒之一,先圣殿就是他于1630年创建的。在足利一室町时代,类似的外事讨论会交给镰仓五山寺的佛教僧侣,他们中文娴熟,能够阅读用古典文言写作的文章。16世纪的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一直是佛教僧侣的特权。汉文抄写本在著名的五山寺里辗转流传,在这里,佛学和道学并驾齐驱。在一个由武士支配战争、由贵族血统和贵族品味主导社会上层的时代,足利一室町政府依赖这些佛教僧侣来维持与明朝的官方往来。在1466—1477年间,应仁之乱扩散到各地,京都主要的

---

<sup>①</sup> Ian James McMullen, “Kumazawa Banzan and ‘Jitsugaku’: Toward Pragmatic Action,” in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eds.,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Essays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37—371. 又见阿部吉雄,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Acta Asiatica* 25 (1973): 1—21.

寺庙都被焚毁,僧人被遣散,镰仓时代的禅僧开始失去他们的文化影响力<sup>①</sup>。

德川时代出现了出身平民的儒者,林罗山和林鵝峰代表了这个在日本政治和社会上新兴群体的开端。许多人像林罗山一样,起初也是僧人,但16世纪战国时代佛教地位下降之后,他们转而以讲习儒学为业。他们能够熟练地读写汉文,因而德川幕府依靠他们来了解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局,而不再依赖那些僧侣<sup>②</sup>。

林鵝峰完成他评论中国变局的著作之后,将之名为《华夷变态》。林鵝峰在序言中指出,因为满洲征服,中国已经从“华”沦为“夷”了。曾以文明优越性自居的明代中国,被野蛮的满洲人打败了,对林鵝峰等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文明优越性已经明确让位于日本,他们并不理会日本在丰臣秀吉时代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就已经失败了<sup>③</sup>。

又如,总是制造麻烦的武士儒者山鹿素行(1622—1685),曾因公开反对程朱正统而短暂入狱,他也宣称满洲征服中国意味着日本比清代中国优越。与总是能够战胜外国入侵的日本相比,中国则是屡屡被蛮夷所征服。山鹿素行认为,满洲不过是一系列征服中国的外来民族中最晚近的一个而已。日本人对于天皇血统万世一系的信仰也成为了日本优于中国的理由,他们对日本民族神圣起源的信仰被用来说明天皇血统的世系牢不可破,其祖先一直追溯到“天照大神”。山鹿素行总结说:“本朝传自天照大神,帝国的世系正统至今从未改变。”<sup>④</sup>

与山鹿素行同时代的浅见絅斋(1652—1711),是崎门学派山崎闇斎(1618—1682)的弟子,他对中国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浅见絅斋的观点在1688和1689年的演讲中已初见端倪,随后又在1700、1701年左右在信中跟同门佐藤直方进行探讨。在公开出版的《中国辨》一书中,浅见否认中国具有“中国

① Martin Collcutt, *Five Mountains: The Rinzai Zen Monastic Institution in Medieval Japan*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和 David Pollack, *The Fracture of Meaning: Japan's Synthesis of China from the Eighth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89. 比较 Willem Jan Boot, *The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Japan: The Role of Fujiwara Seika and Hayashi Razan* (Leiden: Proefschrift, Rijksuniversiteit, 1982), pp. 83—85. Willem Jan Boot 考虑到了韩国儒者在日本的影响,但对于朱子学的兴起,他更强调足利一室町时代的禅儒与德川时代的儒者之间的一致性。

② 今中宽司《近世日本政治思想の成立》(Tokyo: Sōbunsha, 1972)。

③ Norihito, *China in Tokugawa Foreign Relations*, pp. 136—137.

④ 山鹿素行《谪居童問》和《配所残筆》,收入《山鹿素行》,日本思想体系(以下简称NST), Vol. 32(东京:岩波书店,1970), p. 333.

(the Middle Kindom)”地位。他论证说,欧洲人带来的新地理学揭露了中国中心观的虚假。他也提到,早在周代,夷狄所在区域就被纳入了中国版图。例如,舜帝就是来自东夷,后来他成了圣人并统治中国。

佐藤直方也是崎门学派的追随者,他比浅见和山崎都更加激进。1706年,在《中国论集》中,佐藤直方认为儒学经典和神道教典籍不可能都是对的。他还指出,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帝王世系都不是纯粹和不可变更的。所以,佐藤直方同时驳斥了日本和中国帝王的神圣性。对佐藤直方而言,日本和中国都不是“中央王国”,尽管中国以此自居的历史更加悠久<sup>①</sup>。

在这场争论中,浅见和山崎站在一起,结果,崎门学派强调“儒神折衷”,将程朱理学和日本国学联系起来。山崎和他的嫡系传人都不曾明确提出“神圣国体”的日本概念,然而,当他的学说与注重大日本史和国学的水户学派结合之后,一种信仰帝王神圣谱系的日本式民族主义就渐渐浮现出来。当然,这种民族主义的出现已是晚近之事,比如,2000年日本大学入学试题,其中就提到了关于山崎的孔子观的伦理问题。然而,在“儒学”风行整个精英社会的18世纪,这种民族主义显然还不存在。有人向山崎的同时代儒者伊藤东涯(1670—1736)讲述了山崎的回复,伊藤评论说山崎的问题过于愚蠢,根本不值得回答<sup>②</sup>。

对一些人来说,日本现在就是亚洲的“第二个罗马”,但是,德川政府并不敢如此自负地采取行动。丰臣秀吉16世纪90年代入侵朝鲜(1392—1910)的

① 参看浅见綱齋《靖献遗言》,载《山崎闇斋学派》,NST(东京:岩波书店,1980),Volume 31, pp. 416—417. 英文译本见于Wm. Theodore de Bary,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2nd editi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Vol 2, pp. 91—94. 也请参看佐藤直方《韞藏录》, NST(东京:岩波书店,1980), Volume 31, pp. 420—425. 译本又见 de Bary, *Sources*, Volume 2, pp. 96—98.

② 子安宣邦《山崎闇斋学派的敬说と心法の言説》,载《江戸思想史講義》(东京:岩波书店,1998), p. 75. 参看下面一则著名的轶事,山崎闇斋被他的学生问及,如果孔子和孟子带领中国人入侵日本该怎么办,这则轶事也出现在2000年日本大学的入学考试题中(伦理,2000):据说有一次山崎闇斋问弟子,“如果孔子、孟子攻打日本,您如何办?”那时山崎的回答是什么,请加以推测,并在下面若干的想法中选择一个最适当的回答。(一)因为是儒家学者,应当服从孔子、孟子的人格,因此,他们如果来攻打,应当舍弃作为日本人的立场而归顺;(二)日本人格守日本之道,也遵守儒教的道理,即使是孔子、孟子作为对手,也应当为自己国家而战斗,回到这样的状况,也就是遵从了他们所说的道理;(三)儒教是超越国家的惟一的普遍伦理,侵略他国是违反这一思想的行为,孔子、孟子采取与这一伦理矛盾的做法,应当遵从儒教的道理击破他们;(四)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之道是最重要的,儒教不过是学习日本之道的手段,因此,如果真有孔子、孟子来攻打的事情,应当舍弃作为儒学者的立场,为守护自己国家而战。

惨败,仍然沉重地压在幕府将军们的心头。满洲军队于1627、1636年入侵朝鲜并于1644年征服北京之后对日本所造成的威胁,看起来好像要引起德川日本和满洲的直接对抗。事实上,许多在日本的明遗民,比如朱舜水(1600—1682),就曾经大声疾呼德川幕府去援助南明政权。不过,当满洲人发现朝鲜并不对其老家产生任何威胁,他们很快对日本失去了兴趣。再者,他们也无法从中国腾出手来,17世纪70年代,他们平息了三藩之乱,而80年代则致力于处理与俄国人在老家东北边疆引起的冲突。与此同时,德川幕府似乎也没有兴趣与满清建立官方的外交或通商关系<sup>①</sup>。

德川幕府也不承认朝鲜属于中国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因为日本希望比朝鲜要优越,而不是与朝鲜一样居于中国之下。这就产生了一个小型的、以德川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圈,这就是为什么朝鲜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而日本却没有派往汉城的使团。直到19世纪,除了琉球,朝鲜是惟一与日本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外国,它总共派出12个使团前往江户。在1634—1806年之间,琉球一共派出了15个使团<sup>②</sup>。

那种在明代把中国视作文明开化而日本是夷狄的观点,到了德川时代却变成了日本优于满清中国,这场发生在17世纪的思想转变,在随后的著述中变得更加普遍。但是没有人能够超过山鹿素行和日本著名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后来所宣称的狭隘的文化吁求。本居宣长白天以中国的古药方来谋生(日本人称之为“汉方”,下文再作详述),这样他就能在晚上为国学信徒们所开的课程中攻击儒学<sup>③</sup>。山鹿素行强调,对日本来说,如果文明的标准是中国的古文和礼仪,那么,日本能够证明日本优越性的惟一方式只能说日本是基于“儒学模范”之上的。如果德川日本想要成为“第二个罗马”,那么,它就必须证明其人民掌握了儒学,“儒化”程度也超过了中国人。此时,尚未出现让中国人和日本人真诚相信的“西学标准”<sup>④</sup>。

① 也请参看 Kim Seonmin, “Ginseng and Border Trespass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Late Imperial China* 28, 1 (June 2007): 33–61, 以及山本博文《寛永时代》(东京:吉川弘文馆, 1996), pp. 233–234.

② Elisonas, Jurgis (George Elison), “The Inseparable Trinity: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Korea,” in John Ha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4. Early Modern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97–300.

③ 本居宣长《本居宣长全集》(东京:筑摩书房, 1968), Vol. 18, p. 405.

④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Japan: The New Theses of 182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pp. 28–29.

### 三、儒学与日本的近世社会

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同时,日本也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1600—1800年,日本从一个地方武士特权阶层和中央贵族主导的社会变成了新兴商人和平民逐渐掌握权力的商业化社会。儒士作为身份明确的文人群体,他们的兴起也是这些社会变化之一。显然,中国的“士大夫—儒者—画家—儒医”合一成了日本人模仿的对象<sup>①</sup>。

大部分日本学者并没有明确地把自己看成儒生或者文人。他们有些人是还俗的僧侣(比如藤原惺窝、林罗山、山崎斋),有些人以前是武士(比如藤树中江或是失去主人的浪人(如熊泽蕃山),有些人则是药师或武术家,或者是他们的儿子(比如林罗山、山鹿素行、浅见絅斋、荻生徂徕),还有一些人则是市民(伊藤仁斋,1627—1705)。在德川时代早期,他们还处于边缘,然而渐渐地成了日本文化之一流(avant-garde)<sup>②</sup>。

在德川日本时代,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老师、医生和学生来学习中文?特别是这种兴趣为什么在18世纪达到顶峰<sup>③</sup>?随着战国时代的佛教僧侣失去处理外交和国内事务的影响力,这一迹象越来越明晰,因而17世纪开始缓慢地发生这种变化。到18世纪中期,教育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熟谙传统古文的武士、商人、医生和普通平民。许多日本人开始在个人的、商业的或是公共的私塾中以教书为业。比如,平民伊藤仁斋和僧侣出身的山崎闇斋,他们为了争夺学生,在京都堀川河岸面对面地建立了儒学私塾。1662年,仁斋在他儿子伊藤东涯(1670—1736)的帮助下建立了“古义道”,45年中吸引了3000名学生在此学习中国古文。另外,1765年,多纪家族在江户家中开办了一所名为“跻寿馆”的医药私塾。1791年,为了中药的新“汉方”派,德川幕府把它立为官方的医学

① 中村久四郎《考證學概説》,收入《近世日本の儒學》(东京:岩波书店,1941),pp. 701—729。

② 黑住真,“The Nature of Early Tokugawa Confucianism,”*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0, 2 (1994): 340—341, 以及 Kate Nakai, “The Natur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okugawa Japan: The Problem of Sinocentr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 1 (1980): 157—199. 也请参看 Eiko Ikegami, *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这一部分的阐释要感谢 Robert Kaster, *Guardians of Language: The Grammarian and Society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关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社会学研究,参看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nd revised edition. Los Angeles: UCLA Asian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2001)。

馆,多纪家族的许多成员遂占据了高层教职<sup>①</sup>。

“汉方”教师的权威来自于对中国古文的精通,这使得他们有能力给学生讲授系列古文实用语法课程。日本的教师像他的中国同行一样,成为了古文辞的捍卫者,他们通过矫正他人的句读、音韵训诂以及添加密集的注释,成为了上层文化中能清楚表达意见的智囊。最好的老师传授《五经》中的圣人之言,等而下之,更多的职业老师传授医经、算经以及和算(日本算术)<sup>②</sup>。他们积累了经典中大量的古语和虚词,却不能像中国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最好和最聪明”的教师迅速在商人和平民阶层中发现了他们的用武之地;这些人对社会价值非常敏感,他们既缺少贵族与生俱来的社会优势,又蔑视这种优势。当许多平民的社会地位因为掌握古文而上升,失去土地的文盲武士却因还不起商人的债务而堕入贫穷、声名狼藉。许多武士开始意识到,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文化,而不再是世代相承的武术,所以,他们努力学习成为学者或医生<sup>③</sup>。

和中国同行相似,作为精英的一员,儒者身份的认同取决于他对经学、医学以及文学典籍的精通程度。例如,从1753到1756年,本居宣长在京都信奉宋金元医家学说的“后世派”儒者门下学医,尽管如此,本居宣长也阅读那些致力于复兴古代就散佚的“古医方”派的著作。掌握了正确的古文,使得日本人能够传授那些统领古音学、词法学以及语言的种种细微之处的规则。这种依照句法对文本字里行间进行细读的技巧,被当成是一个文明社会与中国进行文化竞争的必要条件<sup>④</sup>。

日本人经由古代典籍,使得他们能够与文化和医学的圣人直接对话。文字变成了进入一个由形式主义、细节、规则、概念以及罕见词汇讨论所组成的世界的入口。因此,儒者对少量经典文本的掌握就成了助其摆脱卑微之人的

① 小曾户洋《汉方の歴史:中国日本の伝統医学》(Tokyo: Taishukan shoten, 1999), pp. 162—167, 以及 Samuel Yamashita, “The Early Life and Thought of Itō Jins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 2 (Dec. 1983): 455—457. 也可参看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p. 152.

② 参看 Mark Ravina “Wasan and the Physics That Wasn’t: Mathematics in the Tokugawa Period,” *Monumenta Nipponica* 48, 2 (Summer 1993): 205—224.

③ 关于经济变化,参看 John W. Hall, *Tanuma Okitsugu, 1719—1788, Forerunner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关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参看艾尔曼《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5—14页。关于日本的医师,参看 Ann Janneta, *The Vaccinators: Smallpox, Medical Knowledge, and the ‘Opening’ of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3—104.

④ 关于本居宣长的 Kanpō 知识,参看《本居宣长事典》,本居宣长纪念馆编(东京:东京堂出版, 2001), pp. 198—200.

低级职业的手段。对文本的分析包括对逐个单字、习语以及句子进行权衡推敲,这使得他以及他的学生踏上声名显赫之路,至少可以再去教别人或卖文为生。18世纪,因为能读写古文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以致使德川幕府将军越来越意识到起用文官来管理他们的领土<sup>①</sup>。

儒者所传授的知识深深渗入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中,财富、声望、文学把精英和贫穷、不识字的无名大众区分开来,那些没有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人现在变得引人注目起来。从前只有僧侣才懂古文辞,儒学为变化中的社会和政治精英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和价值观,使得他们能够识别出他们雄心勃勃的同类。于是,那些接受了儒学教育和以前全部是贵族的统治阶级现在一起分享精英地位。儒学之“文”标志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儒学经典研究为儒者及其弟子提供了上升的社会环境,对那些进入城市网络,由保护者提供权势和声望的人尤为如此<sup>②</sup>。

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一样,识字能力和印刷文化如今在德川日本变得要紧起来,再也不仅仅是上流贵族们附庸风雅的点缀或者禅僧的宗教天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社会中,“文”的价值被大众普遍的文盲无知凸显出来,这使得那些文法教师有了向上爬升的第一块踏脚石,学生们也都被这个以“文化”为名望中心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吸引,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甚至有段时间把“文化”命名为年号(1804—1817)。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争相标榜儒学学者的价值并聘请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儒者们通过开办私塾,编写塾本,成为语言传播和文明发展的媒介。经典教育的第一步是语法,学生们通过学习掌握各种技术性规则才能与初学者区分开来。一旦塾师们掌控了古文的入门之路,这种职业就深入到精英的生活并与之分享。“汉文”是衡量经典教育成功与否的有用标准,因为,它是如此的精确流畅,不像街头巷尾的“俗语”。塾师教会学生分析儒学、医学和文学的形式,以及进行范畴概念化的工作,这些东西是过去从中国传来的而如今在日本被复制。

正如最初的武士和贵族,儒者本身也并不富裕,他们以束修为生。然而,在日本,医生只要把他们学来的经典知识技能转化到临床实践中,利用中国医学提供的中医知识,他们也可以发财。而塾师们倍感耻辱的是,他们不得不在一群傲慢无知的京都贵族世界中寻求饭碗,他们的收入取决于课堂容量以及

① 参看 Herman Ooms, *Tokugawa Village Practice: Class, Status, Power, La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② 参看 Eiko Ikegami, *Bonds of Civility: Aesthetic Networks and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Japanese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